

收稿日期:2025-03-22

斯文在兹:六朝会稽文化世家的审美转型考论

葛志伟¹, 李相银²

(1.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淮安 223300;

2. 浙江传媒学院 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0)

摘要:会稽在唐代行政区域命名中多称越州。然而,唐诗中作为地名与文学意象的“会稽”出现频率远甚于官方认定的“越州”,呈现出非凡的历史底蕴和文化魅力。此历史底蕴和文化魅力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六朝会稽文化世家的持续积淀和逐步丰富。受政治、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六朝会稽文化世家在文化审美观念上出现了从儒学、玄学再到文学的两次转型,不变的是,在此过程中,会稽本土士族和侨姓士族都在努力发现并描摹本土山水形胜之美,而其自身雅韵风流亦不断彰显。山水之美与人文景观交融互渗,最终成为唐代诗人步趋踵武的文化记忆。

关键词:门阀;会稽;文化世家;审美转型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5)05-0091-10

基金项目:绍兴市文化工程重点项目“六朝会稽文化世家与浙东唐诗之路”(21WHZD01-6Z)。

作者简介:葛志伟(1985—),男,江苏淮安人,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李相银(1973—),男,江苏涟水人,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特聘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5.05.063

浙东唐诗之路研究近年来风起云涌,富有创见的论著不断问世。纵览既有成果,作为地域称谓的会稽屡被提及,已成为浙东唐诗之路研究中无法回避的热点。《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会稽郡”条云:“秦始皇二十五年置(前 222)……隋开皇九年(589)废。大业三年(607)又改越州为会稽郡……唐武德四年(621)复为越州。天宝元年(742)又为会稽郡,乾元元年(758)复为越州。后习惯上会稽郡仍为越州的别称。”^[1]据此可知,会稽作为唐代官方认定的郡名只有 16 年,余者皆称“越州”。然检索《全唐诗》,越州出现 58 次,而会稽则高达 133 次^①。上述数据提醒我们,“会稽”称谓中必然积淀着丰富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才引得唐代诗人倾心不已。会稽文化内涵的

① 笔者先用中国基本古籍库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全唐诗》进行检索,后又与中华书局 2011 年增订版《全唐诗》作文献比对,最终得到文中所引数据。

形成以历史长时段来观照,则六朝时居于此地的文化世家功莫大焉。借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2]的名言,我们不妨这样表述:没有六朝会稽文化世家的历史贡献,何来唐诗之路上精彩纷呈的会稽书写?六朝会稽文化世家既发现、描摹出本地的山水形胜,又以其风流雅韵成为唐代诗人步趋踵武的文化记忆。不过六朝会稽文化世家对山水之美的感知、自身风流雅韵的养成,并非朝夕所成,大体上先后经历儒家、玄学、文学三个阶段,其间又掺杂诸多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因素。

一、儒学传统与西晋会稽文化世家的审美品格

谭其骧认为永嘉南渡是“吾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之一大关键,盖南方长江流域之日渐开发,北方黄河流域之日就衰落,比较纯粹之华夏血统之南徙,胥由于此也”^[3]。永嘉之乱带来北人大规模南迁,尤其是代表北方最高文化水准的世家大族的到来,极大提升了南方长江流域的文化品格。会稽从最初偏居一隅转变为南方政治、文化重镇,实从此发端。然在此之前,当京师洛阳文学创作蔚然成风、清淡玄言盛极一时之际,会稽本土世家大族的文化精英依然秉承两汉至东吴的儒学传统。

六朝世家多可溯源至汉代。唐长孺说:“大约在东汉时南北各郡正在逐渐形成较固定的、普遍承认的地方当权大姓。”^[4]与海内知名的吴郡四姓朱、张、顾、陆相似,会稽亦有较显赫的世家大族。《世说新语·赏誉》云:“会稽孔沈、魏顗、虞球、虞存、谢奉,并是四族之俊,于时之桀。孙兴公目之曰:‘沈为孔家金,顗为魏家玉,虞为长,琳宗,谢为弘道伏。’”^{[5]556}孙兴公即为东晋一代文宗孙绰,出自太原中都孙氏。可见至迟到东晋中期,会稽本土孔、魏、虞、谢“四族”社会地位已得到北来侨姓文化精英的承认。《宋书·王弘传》云:“己未间,会稽士人云十数年前,亦有四族坐此被责,以时恩获停。”^{[6]1320}此处出现的“四族”,从上下文看并无具体语境,显然已成为时人约定俗成的指称,亦即《世说新语》所说的“孔、魏、虞、谢”。

事实上会稽“四族”早在汉代便已有部分子弟备受称誉。裴松之注《三国志·吴书·虞翻传》引《会稽典录》云:“河内太守上虞魏少英遭世屯蹇,忘家忧国,列在八俊,为世英彦。”^{[7]1325}魏少英即魏朗,因乱世“忘家忧国”受到士流敬仰,位列“八俊”。“忘家忧国”颇能体现魏朗儒生本色,此举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自幼接受的儒家教育。《后汉书·党锢列传》云:“魏朗字少英,会稽上虞人也……从博士郗仲信学春秋图纬,又诣太学受五经,京师长者李膺之徒争从之。”^{[8]2200-2201}魏朗早年在太学接受正统的五经教育,并因此得到名流李膺等人追随,可见影响非同小可。与北方世家大族形成路径相似,以魏朗为代表的上虞魏氏享有盛名的重要原因,即在于其“家世儒学”。

此情形在孔、虞、谢三大家族中亦普遍存在。山阴孔氏本为北人,汉末因避战乱,孔潜举家从梁国(今河南商丘)南迁至会稽山阴,此后孔氏这一支遂世居于此。作为北方传统家族,孔氏尊奉儒学。定居山阴后,最早可考的经师为孔冲。他是孔潜次子。《晋书·孝义传》云:“年十二,师事豫章太守会稽孔冲,受《诗》《书》《礼》《易》及《孝经》《论语》。”^{[9]2279}从孔冲传授的内容看,他确是博学鸿儒。余姚虞氏家族,被学者视为“汉晋间江东地区学术成就最高的儒学世族”^[10]。虞氏家族累世传经,尤精易学。裴松之注《三国志·吴书·虞翻传》引《翻别录》云:“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舆令成,纘述其业,至臣祖父凤为之最密,臣亡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于凤,最有旧书,世传其业,至臣五世。”^{[7]1322}五世传易,锲而不舍,至虞翻《周易注》始集大成。山阴谢氏最早见于正史的是谢夷吾。《后汉书·方术列传》载班固举荐夷吾一文,略云:“(谢夷吾)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仁足济时,知周万物。加以少膺儒雅……”^{[8]2713}可见夷吾虽擅方术,但仍见称儒雅。此外会稽本土士族中,早期声望稍逊于“四族”的山阴贺氏亦以儒学为世所重。裴松之注《三国志·吴书·贺齐传》引虞预《晋书》云:“齐伯父纯,儒学有重名。”^{[7]1377}贺纯擅礼学,自此

贺氏遂以此传家。清人李慈铭通览《南史》后感慨说,山阴贺氏“六世以三礼名家,为南土儒宗”^[11]。

此时会稽士族虽未必皆为儒学世家,但同尊儒术应无可疑。他们重事功,开疆辟土,积累产业,如贺氏自始即与孙吴政权合作。《三国志·吴书·贺齐传》记载:建安元年(196),孙策始治会稽,随即举贺齐为孝廉,而齐亦投桃报李,助孙策平定郡内叛乱;建安十六年,齐又平定余姚民郎稚宗族叛乱,因此受到孙权礼遇,“被命诣所在,及当还郡,权出祖道,作乐舞象……权望之笑曰:‘人当努力,非积行累勤,此不可得。’去百余步乃旋”^{[7]1379}。所谓“人当努力,积行累勤”,正可视为对贺氏子弟世代追求事功的概括。当然,会稽士族中也有像虞氏这样因治经而享有盛名的大儒,仅《隋书·经籍志》著录,便有虞翻《周易注》《周易日月变例》《春秋外传国语》《论语注》等。无论是像贺氏那样追求事功,还是如虞氏这般著书立说,甚至像孔氏那般遍授群经,其实都是汉儒的价值观念。这样的价值观念中当然也包含特定的审美取向,即崇实尚有、重伦理、重事功。而如此审美取向,事实上并不有利于士人向外去发现自然山水,向内去开拓心灵世界。

当曹丕高呼“夫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时,会稽士族整体上并未感受到这股新的时代潮流。曹丕所谓的“文章”已不限于儒家经学范畴,而是涵盖诗、赋等文学文体,这是具有深刻思想史意义的创举^[12]。如此标榜诗赋文章,预示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得风气之先的北方士人积极运用新诗体,创造出五言腾涌的时代。三曹七子逝去,文人五言诗创作暂时陷入低谷,但仍涌现出阮籍、嵇康等优秀诗人接续传统,而此时包括三吴、会稽等郡在内的江南,却并未出现有影响力的诗人。江南地区声誉卓越的士人,往往集中在吴郡、会稽。晋武帝对此曾赞叹道:“江东之有吴、会,犹江西之有汝、颍,衣冠人物,千载一时。”^[13]倘若稍加比较吴郡、会稽士族北上入洛后的行为,就会发现一些有趣的文化现象。

日本学者佐藤利行将陆机在太康十年(289)入洛视为西晋文学史上的标志性事件^[14]。但有必要加以补充说明的是,太康十年并非陆机首次入洛。《晋书·陆机传》云:“年二十而吴灭,退居旧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年……至太康末,与弟云同入洛。”^{[9]1467-1472}然据傅刚考证,吴亡后,“二陆兄弟并未退居旧里,陆机去了洛阳,陆云为周浚从事”^[15]。陆机此次赴洛滞留时间极短,次年春天,陆机即被允许还乡,因此不易引起关注。但正是这次短暂的入洛经历使得陆机有机会提前感受京师洛阳的文风,了解到贵族名流圈子中盛行的审美文化。否则何以太康末甫一入洛即能名动天下?此间缘由必与所谓的“闭门勤学,积有十年”相关。当陆机于太康十年二次入洛时,他已能凭借数年来积累的文学声望获取京师名流赏识。一代文宗张华为之揄扬,甚至有“如旧相识”的感觉。既然素未谋面,这种亲切感势必来自陆机早先传入京师的诗文作品。陆机入洛前所作诗文存世不多,可考者惟《毗陵侯君诔》《吴贞献处士陆君诔》《与弟清河云诗》《辨亡论》《平复帖》《赠顾令文为宜春令》等。这些作品迎合了京师文坛尤其是上层官僚与贵族交际圈对繁缛、典雅文风的偏好,故能得到该群体的认同。陆机后来能执文坛牛耳,与其闭门勤学十年、主动迎合京师文风不无关系。但这种事情却很少发生在会稽士族身上。

会稽士族于吴亡后最早北上洛阳者是孔愉。《晋书·孔愉传》云:“愉年十三而孤,养祖母以孝闻……吴平,愉迁于洛。惠帝末,归乡里。”^{[9]2051}“吴平”为太康元年(280),晋惠帝司马衷在位时间为太熙元年(290)至光熙元年(306),故所谓“惠帝末”,当为公元300年以后为宜。可见吴平之后,孔愉即迁居洛阳,至其重返故乡前后达十余年。他是被羁押还是自愿入洛,史书并未记载。入洛十余年间,孔愉是否出任为官、与何人相交往,皆付之阙如。但有一点似可确认,即孔愉未为京师盛行的文风所化。惠帝末年,回到故乡的孔愉隐迹新安山中,改姓孙氏,以稼穡读书为务。十载洛阳生活似乎对孔愉如同南柯一梦。他和他的家族仍像从前一样,以耕读为己任,等待命运的垂青。

会稽士人最早入洛为官者是贺循。贺循入洛为官系陆机举荐。当陆机从洛阳返回故里闭门读书时,贺循正担任阳羨令、武康令等卑微官职。由于朝内无援,贺循久不得进,社会声望尚局限于江东。元康八年(298),担任著作郎的陆机上疏举荐说:“伏见武康令贺循德量邃茂,才鉴清远,服膺道素,风操凝峻,历试二城,刑政肃穆……至于才望资品,循可尚书郎。”^{[9]1824-1825}然皇帝并未因陆机的这番说辞而立刻征召贺循,也未授予其尚书郎官职,而是“久之,召补太子舍人”。太子舍人职位自然无法与尚书郎相提并论,可见陆机眼中“才望资品”皆为第一流的贺循,尚无法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青睐。贺循入洛为官正是“八王之乱”最激烈之时,太康文坛流风余韵已荡然无存。《晋书·贺循传》云:“赵王伦篡位,转侍御史,辞疾去职。后除南中郎长史,不就。”^{[9]1825}赵王司马伦篡位时间为永宁元年(301),可见贺循从担任太子舍人到转任侍御史后辞官去职,只在二三年之间。如此短暂入洛为官经历,尚未能对其文风形成实质性的改变。而司马伦篡位后,贺循不愿与之伍,愤然辞官的行为,正反映出传统儒生根深蒂固的忠义立场。

以孔愉和贺循为代表的会稽士人在孙吴政权灭亡后,有过或逡巡十余年,或短至二三年入洛经历。然而由于与司马氏政权的貌合神离,会稽士人并未能真正融入洛阳的贵游圈子。当他们回归故土时,亦未能顺势将洛阳盛行的审美风尚带到会稽。如果纯粹凭借会稽本土士族的力量,或许并不能将文化与审美双重视域中的会稽呈现于世。比如镜湖,在酷爱山水的唐代诗人李白笔下,是“镜湖三百里,菡萏发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隘若邪?回舟不待月,归去越王家”(《夏歌》)^{[16]263},是“镜湖水如月,耶溪女似雪。新妆荡新波,光景两奇绝”(《越女词》)^{[16]1891}。上引李白二诗中,镜湖似已褪去其物的本质,在文化与审美的双重视域中呈现出绝对的纯粹之美。然而镜湖开凿之初,其现实功能却是灌溉农田。《太平御览》卷六六“地部”引《会稽记》云:“汉顺帝永和五年,会稽太守马臻创立镜湖。在会稽、山阴两县界筑塘蓄水,高丈余,田又高海丈余。若水少,则泄湖灌田。如水多,则开湖泄田中水入海,所以无凶年。”^[17]《会稽记》作者孔灵符,出自会稽山阴孔氏,由他讲述镜湖的实用功能并撰写《会稽记》,似乎最合适。所谓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镜湖之美被发现,绝不能出自会稽士族固有的文化审美,而是要归因于北方侨姓士族南迁的刺激。

二、玄风雅韵与东晋会稽文化世家的审美转型

永嘉南渡前,活跃在京师洛阳的士大夫约略可分为三类:皇室贵族、高门士族、中下层寒素文人。皇室司马氏子孙表面上多迹沉儒雅,务深方术,故史籍所载鲜有能文者;以高门士族为主体的上层士大夫多尚玄谈、崇尚清谈,不以能文为高;寒素文人中虽多有以诗文名世者,然身如转蓬,位卑言轻,仕途命运尚须依附前两类人物才有施展之可能,如诗人陆机、潘岳、左思等,莫不如此。三个群体之间紧密关联,共同促成一种动态的平衡机制。然而这种平衡本身极不稳定,永嘉之乱的突然爆发,更是直接将其摧毁殆尽。诸多寒素文人在这场动乱中无力南迁,丧身殒命者不计其数。《文心雕龙·时序》云:“前史以为运涉季世,人未尽才。诚哉斯谈,可为叹息。”张立斋说:“人未尽才者,上文所举,皆晋知名之士,以乱世浮沉,多不能善终,如张、潘、二陆,皆以诛死,惜长才之未尽,故结语有叹息之言也。”^[18]可见太康、元康时代数量可观的寒素文人群体,至此凋零殆尽。西晋原以寒素文人为主、各士人阶层共同参与的文坛格局遭到破坏。江左文坛基本上由北来高门士族把持,这也直接造成玄风独振的现象。

刘师培指出,“自江左以来,其文学之士,大抵出于世族”^[19]。江左文坛主体的变更,对江南原有文化与审美的影响是深层次、全方位的。其中尤以清谈玄言一事为最。在此之前,无论是吴郡士族还是会稽士族,都未出现清谈玄言的名士。此举自然与这些江南士族固守儒术传统有关。然而在永嘉南渡之后,江左一带迅速成为新的清谈玄言中心。对此,罗宗强认为:“他们在西晋养成的生活方式实在是难以改变,他们在过江之后,只要还有可能,便会恢复他们以往的生活方

式。”^{[20]128}所谓“他们”，即指经历永嘉南渡的中朝谈玄名士群体，以王导、庾亮、卫玠、温峤等为代表。正是这些中朝名士将昔日谈玄之风从繁华的京洛带到了广袤的江南，在营造值得留恋的精神家园的同时，也促成新型的文化与审美观念在江南地区的流行。《文心雕龙·时序》云：“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21]675}作为反对玄言文学的批评家，刘勰自然会对“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的状况感到不满。然而，倘若变换视角，从浙东唐诗发展演进之路的角度来重新审视，那么，很显然，当年正是这群清谈玄言名士及其后继者的到来，才得以进一步发现并表现出浙东尤其是会稽的山水之美，以纷繁多样的文化审美造就了诸多惊世绝俗的文学艺术。这些功绩仅凭会稽本土士族的力量显然无法完成，换句话说，不堪回首的永嘉南渡客观上为会稽自然山水之美的发现，提供了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人。

事实远非如此简单。这些中朝名士及其后继子弟，不仅是会稽山水之美的发现者与书写者，而且还是历史人文景观的创造者。他们的风流雅韵与自然山水交织在一起，构成会稽魅力的两级，成为唐代诗人生生不息的文化引力，故其间所蕴藏的积极意义可谓不言而喻。最负盛名的，当属永和九年三月三日由名士领袖王羲之组织的兰亭集会。此次集会早已超越一般文人雅集的性质，转而凝练为一种极具历史底蕴和人文魅力的文化符号，频频出现在唐代诗人的文化记忆中。盛唐诗人孟浩然《江上寄山阴崔少府国辅》云：“春堤杨柳发，忆与故人期。草木本无意，荣枯自有时。山阴定远近，江上日相思。不及兰亭会，空吟祓禊诗。”^{[16]1689}崔国辅是诗人的好友，会稽山阴人氏，开元十四年(726)进士。春堤上柳芽初吐，翠烟点染，轻轻拂面，如此良辰美景，让诗人想起与友人的约定无法实现，遂难免悲叹起来。山阴无论是远在天边还是近在咫尺，可惜诗人此刻都已无法前往，本该享有的热闹非凡的友朋盛会，现在却无法赴约，只能独立江水之上遥寄相思。很显然，山阴在此诗中已经不是一种纯粹的地理位置概念，而是一种嵌入落寞与遗憾的文化表征。因为当年“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兰亭集会正发生在这里，对诗人来说，文化记忆中兰亭盛会的热闹风雅与眼前的落寞遗憾，形成鲜明对比。德国历史学家扬·阿斯曼(Jan Assmann)说：“即使是在文化记忆中，过去也不能被依原样保留，过去在这里通常是被凝结成了一些可供回忆附着的象征物。”^[22]循此理论，则兰亭对孟浩然而言正是一种“可供回忆附着的象征物”。

就过江名士而论，此群体引领的文化审美观念并非一成不变。梳理东晋南朝史料，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勾勒出此种转变的大致情形。而这种文化与审美观念的转换变化，对后世浙东唐诗之路的形成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已有学者敏锐指出，西晋玄学家很少兼善文学，同时文学家也很少兼长玄学，两者之间不兼容现象相当明显^[23]。可是永嘉南渡之后，不善文学之事的玄言名士却成为文坛主角，以至玄言诗盛行于东晋一朝。这绝非一种偶然现象，至少可以说明，文采风流，尤其是文学才华，正逐步得到这些玄言名士们的认可。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过江后玄言理论创新难以为继。因为西晋郭象的《庄子注》在玄言理论层面已臻于极盛。冯友兰说：“郭象的哲学体系，是魏晋玄学的高峰。高峰之后就是尾声了。”^[24]康中乾亦称：“如果说魏晋玄学发展中，正始玄学和元康玄学重在理论建构的话，那么东晋玄学则重在理论的运用，特别是将郭象‘独化’论玄学思想贯彻运用于实际生活中。”^[25]在此情形之下，清谈活动中说什么的重要性就渐渐被怎么说取代。注重文辞与吟咏愈发成为名士们清谈的重要特点。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名士对文辞与吟咏的重视，是以玄理表达为旨归的。他们在彼时诗文创作中，仍以畅谈玄理为第一要义。

《庄子·齐物论》云：“非彼物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为使。”郭象注云：“彼，自然也。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者，即我之自然，岂远之哉！”又云：“凡物云云，皆自尔耳，非相为使也，故任之而理自至矣。”成玄英疏云：“言我禀受自然，其理已具。足行手捉，耳听目视，功

能御用,各有司存。”^[26]从理论上说,世间万物包括人在内,“既不可能是由无或道创生的,又不可能是由另一个事物创生的,也不可能是由自己创生的(因为此时它还根本不存在),那么其生成就只能是不知其所以生而自生的结果”^[27]。但至少可以认为,最高等级的“无”或者“道”,无差别蕴藏在自然万物包括人身上。然而人所面临的生存环境与社会场域极其复杂,再加上个体的“性分”有所差异,故对玄之又玄的“无”或“道”的体验会受到遮蔽。这就需要借助于外物的启迪与印证,才能去除遮蔽,抵达玄冥之境。如果说人的本性会受到私欲和外界因素干扰,那么山水则更无限接近于“无”或“道”。循此而论,秉承自然之性的山水必然会成为最佳体玄悟道之处,而它也就顺理成章成为玄言名士心中“质有而灵趣”的客体。

从玄言名士借山水体玄悟道到山水之美真正被发现,再到后来浙东诗歌之路的渐渐形成,必然是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士人阶层的文化审美观念也完成了由玄学自然观向山水审美观的转化^[28]。其中最有代表性也最有说服力的文化事件,首推永和九年三月三日发生在会稽山阴的兰亭雅集。关于此次文人雅集的初衷,组织者王羲之说得很清楚:“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29]“修禊”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传统习俗,在农历三月三日,人们聚集在水滨嬉戏洗濯,以此袪除不祥和祈福。但以王羲之为首的名士们齐聚水滨,显然有更重要的事情可供消遣。王羲之《兰亭诗》云:“猗与二三子,莫匪齐所托。造真探玄根,涉世若过客。”^[30]^[896]人生在世如匆匆过客,贵贱贤愚共此一理。这种内心深处的焦虑,只能寄希望于玄理来荡涤抚慰,也就是所谓的“造真探玄根”。至于为何要选择“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的风景绝佳之处,虽说有嬉戏洗濯、完成修禊之事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可以“畅叙幽情”,藉此荡涤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无穷无尽的情累。

山水在兰亭名士眼中既是真实的娱乐载体,又是优质的悟道媒介。兰亭雅集虽能令人快乐,但名士们难道只为追求外在的感官刺激吗?王彬之《兰亭诗》云:“临川欣投钓,得意岂在鱼?”从山水中“得意”,比“临川欣投钓”更具魅力。此类思想观念在晋宋之际的名僧慧远那里,也曾被清晰地表述。其《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云:“乃悟幽人之玄览,达恒物之大情,其为神趣,岂山水而已哉!”^[90]^[1086]体玄悟道过程中,“情”总是要被“理”抑制。这种文化审美心理,即便是到了刘宋时期谢灵运的山水诗里,也依然有较明显的体现。有学者指出,“谢灵运不满足于对山水的表面描摹,诗中精心设计的,是富有强烈主体意识的‘情理’的此消彼长的结构:情之所起-理之顿悟-情之所灭。这样的结构,让谢灵运山水诗拥有了浑厚的哲学底蕴。景色的描摹、典故的凝结等艺术手法,是为这种哲学底蕴服务的”^[31]。由此可见,谢灵运山水诗中屡被后人诟病的“玄言的尾巴”,恰恰是诗人获得“理”的静穆时刻。

总而言之,东晋会稽文化世家由本土士族和侨迁士族共同构成,他们将玄风雅韵融入自然山水,并藉此参玄悟道。他们所寄意的山水被烙上老庄思想的深刻印记,虽与唐诗中的山水描写多有不同,但无论如何,山水作为被表现的客体,至此已走向台前,等待着下一个审美时代的唤醒。

三、文采风流与南朝会稽文化世家的审美新风

六朝会稽文化世家的审美观念演进,并非呈单线蝉联而下之势。事实上每一次转型,都可以从前一种审美观念中洞察细微迹象。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写道:“要以见魏晋南北朝时期一切学术文化,必以当时门第背景作中心而始有其解答。”^[32]盖六朝会稽文化世家由玄学向文学的审美转型中,最有力者仍是士族精英。《晋书·孙绰传》云:

绰字兴公,博学善属文。少与高阳许询俱有高尚之志……绰与询一时名流,或爱询高迈,则鄙于绰,或爱绰才藻,而无取于询。沙门支遁试问绰:“君何如许?”答曰:“高情远致,弟

子早已服膺。然一咏一吟,许将北面矣。”^{[9]1544}

此文献早已为中古文史研究者谙熟。不过当前学界在解读这则材料时,几乎都将其视为文学创作上许询不如孙绰的有力证据。我们不禁要问,许询当时的文学成就真的比不上孙绰吗?事实恐怕并非如此。《世说新语·文学》云:“简文称许掾云:‘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云:“询有才藻,善属文。”^{[5]310}许询五言诗成就极高,甚至得到简文帝司马昱“妙绝时人”的极高赞赏。有时就连孙绰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位好友兼竞争者的文学才华确实非同一般。考孙绰《答许询诗》云:“贻我新诗,韵灵旨清。灿如挥锦,琅若扣琼。”^{[30]900}“贻我新诗”即指许询所赠之诗,虽已不可复见,但从孙绰“韵灵旨清”之论中,我们依然能够有所体会,故当日孙、许齐名绝非无端。循此而论,则上引《晋书·孙绰传》更值得关注的其实是如下问题:在玄风大盛、清谈流行的东晋中期社会,孙绰为何要将象征名士风流的“高情远致”推让给许询,而自己却甘愿选择“一咏一吟”,且自得之意溢于言表?《晋书》明明载其“少与高阳许询俱有高尚之志”,据此可证,孙绰事实上并不轻视“高情远致”。众所周知,“高情远致”也是东晋玄言名士社交场合必备的文化素养。笔者认为最合情理的解釋是,孙绰在“高情远致”与“一咏一吟”之间,更倾心于占据后者。换言之,对孙绰这样名满士流的名士而言,以“一吟一咏”为表征的文学创作显然更具魅力。

孙绰出自太原中都孙氏,与之齐名的许询出自高阳新城许氏,皆为北来侨姓士族中颇有影响的名士。彼时与之交往者,不是清谈名士即为贵族名流。故他们所代表的也恰是东晋中叶社会上最活跃的文化精英。此群体虽热衷玄言,但部分名士亦倾心于“一吟一咏”带来的成就感。此举已然成为整个士人交游圈子中逐渐形成的不容忽视的文化审美新风。《晋书·孙绰传》云:

(绰)绝重张衡、左思之赋,每云:“《三都》、《二京》,五经之鼓吹也。”曾作《天台山赋》,辞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当作金石声也。”荣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官商。”然每至佳句,辄云:“应是我辈语。”^{[9]1544}

《晋书》编撰者为印证孙绰所言不虚,遂将此段文字紧承在“孙许优劣”之后。《天台山赋》是孙绰颇为自豪的文学作品,词旨清新,音韵铿锵,于晋赋中最为杰出,在后世亦享有盛誉。故当此赋初成之时,孙绰即以之示好友范荣期。后者初则轻视,略有嘲讽的意思,然每读至佳语即称“应是我辈语”。此处“我辈”当如何理解?考《晋书·范启传》云:

启字荣期,虽经学不及坚,而以才义显于当世。于时清谈之士庾龢、韩伯、袁宏等并相知友。为秘书郎,累居显职,终于黄门侍郎。父子并有文笔传于世。^{[9]1990}

范启出自南阳范氏,系尚书右丞范坚之子,与名士范汪、范宁同宗,亦是门阀士族子弟。然与其父相比,荣期的经学修养已远不及之,惟以才义名于世,据此可见南阳范氏一族家学门风的悄然变化。荣期交往的朋友圈中,主要包括庾龢、韩伯、袁宏等谈玄名士。庾龢出自颍川庾氏,为晋中兴名臣庾亮的少子。《晋书·庾龢传》云:“好学,有文章。”^{[9]1925}韩伯字康伯,家世虽无文献可征,然系当时清谈领袖殷浩外甥,故在注重婚宦二途的东晋社会,亦得厕身于名流。《晋书·韩伯传》云:“及长,清和有思理,留心文艺。”^{[9]1993}袁宏字彦伯,出自陈郡袁氏,系前朝侍中袁猷之孙。《晋书·袁宏传》云:“有逸才,文章绝美。”^{[9]2391}据此,则荣期所称之“我辈”,实指这样一个群体:既有清谈名士之身份,复具属文之士的美名,且多为当世高门子弟。从此群体的竞相追逐中,完全能感受到上文一再提及的文化审美新风尚。

更有甚者,随着人口大规模向南迁移,这个群体中的名士们还将此种文化审美新风尚带到了浙东一带,尤其是名士最为集中的会稽。这种文化审美新风尚必然要对会稽本土士族固守的尚

儒之风形成冲击,并催生出新的文化生态。而与之相伴而生的玄言与吟咏诸事,则借助于浙东一带无与伦比的秀丽山水,迅速蔓延开来。比如上面重点提及的孙绰、许询,乃至一代名僧支道林,都曾寓居会稽,并留下诸多活动印记。再如《世说新语·雅量》“谢太傅盘桓东山”条刘孝标注引《中兴书》云:“(谢)安元居会稽,与支道林、王羲之、许询共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谈说属文,未尝有处世意也。”^{[5]437} 此处“谈说”与“属文”连用,似亦可为这种文化审美新风尚作一旁证。有学者研究指出,部分永嘉南渡士族“有雄厚的资本营建庄园,可以为山水游览提供强有力的经济支持”^{[33]437},这也是此种文化审美风尚得以蔚然成风的重要外部因素。

千百年来,谢安一直是文人士大夫推崇、仰慕、仿效的理想人格典范。谢安享有盛名,离不开会稽山水的点缀。作为谢氏家族第一代寓居会稽的人物,谢安从少年时代踏上这片土地的那一刻,便注定与之缔结不解之缘。考之史料,谢安早年主要居住在会稽郡上虞县东山附近。原本平凡无奇的东山,直到谢安的到来才变得神圣。后世文人津津乐道且常付诸笔端的东山再起、东山高卧、东山之志等掌故,无不在彰显着这座小小山丘的举世无双。因为谢安,东山才热闹起来,才充满历史文化的气息。从某种意义而言,谢安与东山俨然融为一体,无法割舍,成为后世凭吊的文化象征物。诸如谢安这样的名士很快便陶醉在会稽的山光水色之中,纷纷安家于此。当然,他们如此醉心山水,最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试图借自然山水来荡涤情志,完善人格,体悟玄境,将中朝以来的玄学思想,真正贯彻运用于实际生活之中。

但上述过程中,我们也能看到来自文学的表现力量正在悄然生长。由于玄言理论层面难以继续开拓,故名士们所畅叙的玄理在本质上并无多大差别,而如何表达玄理,就有了很大的发挥空间。这一点在《兰亭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有人借歌咏古圣贤荡涤情志,更多人则选择寓玄理于山水。兰亭美景昭昭可见,如何巧妙措辞才能耳目一新,无形中就成为兰亭名士的创作焦虑。正是这种焦虑,在宴会娱乐中激发了他们竞骋辞藻的热情。兹举一例,如“鱼跃水中”是水滨最常见的景象,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那种自由轻快、无拘无束、全真远害的心态。这与当时兰亭游戏水滨之情形暗合,故多位名士诗中有所涉及。但细读文本,可知诗人们在描绘此番景象时的匠心独运,如“腾鳞跃清泠”(谢万)、“游鳞戏澜涛”(孙绰)、“绿波转素鳞”(王宿之)、“游鳞戏清渠”(王彬之)等。其中,鱼有“腾鳞”“游鳞”“素鳞”之称,水有“清泠”“澜涛”“绿波”“清渠”之异,瞬间动作有“跃”“戏”“转”之别。风景不殊而文辞各异,兰亭名士穷力追新的创作心理表现得尤为明显^[34]。

除诗歌创作,在东晋士人日常生活中也能找到类似的材料。《世说新语·言语》云:“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5]170} 顾长康即著名文士、画家顾恺之,他从会稽返回荆州,时人问其会稽山川之美。会稽境内的山水之美,早已人所共知,故我们稍加思索就会发现,时人想要问顾恺之的,并非会稽山水美不美,而是其美的具体情状如何。换句话说,时人只是迫切想知道,在这位闻名于世的才子画家眼中,会稽山水之美会被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述出来。故当玄言退去,作为体玄悟道媒介的自然山水便会向独立的审美客体转变。

玄言与山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人们的文化审美观念即藏身其间。这正如刘勰所言,“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21]66}。当山水美感体验超越清淡玄言的愉悦,才华横溢的名士也就悄然完成向文士的转身。玄言活动在南朝虽时有发生,但其影响力已大不如前。罗宗强说:“要之,宋、齐两朝思想领域中玄学思想已不占主要地位,玄风在士人生活情趣、生活方式中影响亦已淡化……”^{[20]133} 此论颇具说服力,如东晋玄言名士普遍爱好的玄言诗,在南朝檀道鸾、沈约、刘勰、钟嵘等人的著作中却遭到最严厉的批评。南朝文士追求的是诗赋文章,是“偏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的写作技艺。钟嵘《诗品序》对齐梁之际此番景象的描述最为生动:“至

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35]无论实际创作成就如何,至少在热衷文学创作层面上,南朝文士较其尚玄的先辈,已有天壤之别。《梁书·王承传》亦云:“时膏腴贵游,咸以文学相尚,罕以经术为业。”^{[86][585]}可见当时多数门阀士族子弟已抛弃安身立命之儒家经术,反而转向“以文学相尚”。

六朝会稽文化世家由本土士族和侨姓士族共同组成,故在文化审美观念上呈现出较多的融合性。当然,由于北来侨姓士族在政治、文化、门第上更具影响力,这种融合主要是会稽本土士族向侨姓士族学习借鉴。如会稽虞氏曾是江东典型的儒学世族,学风偏于保守,《晋书·虞预传》云:“预雅好经史,憎疾玄虚,其论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发,所以胡虏遍于中国,以为过衰周之时。”^{[9][2147]}作为传统儒士,虞预对名士任诞之风深恶痛绝。但在南北士族合流的会稽郡,虞氏子弟必然会受侨姓士族热衷玄言的影响。《世说新语·品藻》云:“会稽虞骞,元皇时与桓宣武同侠,其人有才理胜望。”^{[5][605]}讲究“才理”正是玄言名士的基本素质。南朝以降,会稽虞氏更是涌现出诸多知名文士。《南齐书·陆厥传》云:“会稽虞炎,永明中以文学与沈约俱为文惠太子所遇,意忤殊常。”^[37]王永平说:“纵观虞氏家族文化的总体进程,很显然,进入南朝后,其家族经史传统日渐式微,而文学才艺则蔚为大国。”^[38]虞氏家学门风的变化,正是会稽本土士族发展演变的缩影。会稽本土士族与北来侨姓士族不断融合,共同经历文化审美观念由儒学向玄学、由玄学向文学的两次变化。这些变化对于浙东唐诗之路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从山水、名士、玄言、文艺等维度,向唐代诗人彰显浙东地区独特的文化底蕴,也吸引他们踏上这条山水审美与文化朝圣交织的诗歌之路。

参考文献

- [1] 史为乐. 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增订本)[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101.
- [2] 王德威. 被压抑的现代性: 没有晚清, 何来“五四”[M]//王德威. 想象中国的方法: 历史·小说·叙事.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6: 16.
- [3] 谭其骧. 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M]//谭其骧. 长水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 206.
- [4] 唐长孺. 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M]//唐长孺. 魏晋南北朝史拾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25.
- [5] 余嘉锡. 世说新语笺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6] 沈约. 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7]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8] 范曄.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9] 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10] 王永平. 六朝时期会稽虞氏之家风与家学[J]. 南都学坛, 2022(4): 14-20.
- [11] 李慈铭. 越缦堂读书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264.
- [12] 葛志伟. 再论曹丕《典论·论文》的写作时间及缘起[J]. 文学评论丛刊, 2013(1): 62-69.
- [13] 严可均. 全隋文[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56.
- [14] 佐藤利行. 西晋文学研究[M]. 周延良,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2.
- [15] 傅刚. 陆机初次入洛时间考辨[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1986(2): 55-57.
- [16] 全唐诗(增订本)[M]. 中华书局编辑部,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 [17] 李昉, 等. 太平御览[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223.
- [18] 张立斋. 文心雕龙注订[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0: 388.
- [19] 刘师培. 中国中古文学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94.
- [20] 罗宗强.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 [21]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 [22] 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46.
- [23] 徐梁.西晋时期玄学与文学不兼容现象之构成[J].文学遗产,2018(6):28-38.
- [24]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97.
- [25] 康中乾.魏晋玄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64.
- [26] 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56.
- [27] 韩林合.郭象独化说新解:兼与维特根斯坦的相关观点比较[J].文史哲,2018(4):50-60.
- [28] 葛晓音.东晋玄学自然观向山水审美观的转化:兼论文通注《逍遥游》新义[J].中国社会科学,1992(1):151-161.
- [29] 桑世昌.兰亭考[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12.
- [30] 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31] 蔡丹君.理来情无存:谢灵运山水诗的篇体思想[J].文学遗产,2022(5):31-43.
- [32]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M].北京:三联书店,2009:207.
- [33] 杨健,董秀秀.永嘉南渡诗人的生活际遇与心态转变[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2(2):87-94.
- [34] 葛志伟.东晋玄言诗的第三种价值:从“孙许优劣”论谈起[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7(5):69-79.
- [35] 曹旭.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65.
- [36] 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585.
- [37] 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900.
- [38] 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282.

The Aesthet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in Kuaiji in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

GE Zhiwei¹, LI Xiangyin²

(1.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Huaian, Jiangsu, 223300, China;

2.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Zhejiang, Hangzhou, Zhejiang, 31000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Kuaiji Prefecture in today's Zhejiang Province was also known as Yuezhou. Nevertheless, Kuaiji, as a geographic name and a literary image, was much more popular than its official name Yuezhou in Tang poetry, showcasing its extraordinary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and influence. It is attributable to the cultural aristocratic families in Kuaiji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 Influenced by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the cultural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Kuaiji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 underwent two successive aesthetic transformations—from Confucianism to Metaphysics, and then to literature. In this process, they endeavored to discover and depict the beauty of the local landscapes with refined and elegant taste, which were worshiped and imitated by the poets of Tang Dynasty.

Key words: aristocratic families; Kuaiji; cultural aristocratic families; aesthetic transformation

〔责任编辑:何敏敏〕